

巨资助和直接从事应用研究以至基础研究,原因正在于此。但即使在知识经济时代,新知识(特别是基础科学知识)能够直接实现的经济价值都是十分有限的。知识的经济价值的充分实现,还有赖于进一步形成新的思路,开发新的技术、工艺、管理方式,形成新的产品和服务,并大规模地推向市场。知识生产包含一个多级开发链。在我国,针对市场需求的知识产品与服务的开发和经营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并极大地制约了大学知识资源的经济价值的实现。硅谷、128号公路带、剑桥科技园、中关村等的实践表明,大学应该也能够成为培育知识产业的孵化器。

最后,大学应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库。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将显示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威力。它在为更多的人带来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迅速而剧烈地改变着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生存环境,也给个人已经形成的行为模式带来巨大的冲击。使人们在利用科技的同时,有一种被科技所反制的危机感,其负面影响至今尚未得到充分评估,但已经受到关注。人们希望发扬人文精神,以形成强有力的思想引导,防止人类的发展单纯被科技所左右而失去方向。这样的思想只能是在借助于人类已有的全部思想精华,以解决当前的种种问题中产生。大学具有人文资源和文化环境的优势,并致力于整理和保存人类优秀的思想遗产。从这种意义上讲,大学已经是一个思想库。但我们需要的决不只是死的思想资料库,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不断孕育新思想的活的思想库。没有任何其他机构比大学更能胜任提供新思想,批判旧传统和引导社会发展的重任。

### 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完成其使命的需要

可以说大学还远没有为完成这些使命作好准备,就大学制度来说,还存在种种不能胜任新使命的缺陷。大学制度包括组织机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工作机制(包括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活动的运作模式)和制度创新机制。

在组织机构方面,院校合并形成的巨型大学中组织机构重复设置、运转不灵的混乱状况还比较严重。即使只是院校内涵的急剧扩张也会强烈要求进行机构调整。但如何设置机构才能使大学胜任日益多样和复杂的使命,提高知识生产效率?是增加管理层次,强化科层管理,还是减少管理层次,增强基层活力?

在决策机制方面,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基本职能活动的决策,尚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现在的大学制度还不能克服院系和职能管理部门决策的狭隘性,往往是各行其是,不能保障大学决策的科学性和协调性,为了适应知识价值的多级开发的需要,大学应该建立怎样的决策机制?

在激励机制方面,学校的产权(所有权、经营权、利益分配权)结构还不能激励社会投资办学,不能激励大学校长成为高等教育事业家,不能激励教师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和合作研究,这都是大学提高知识生产能力的障碍。

在资源配置机制方面,人事管理制度还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知识资源的系统管理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跨院系、跨学校乃至跨国配置和利用教育资源和研究资源还有许多障碍。这些都不能适应知识生产的基本要求。

在工作机制方面,我国大学的课程生成系统还有待科学化,教学模式还基本上是传统的,既未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也不能适应培养创造型人才的需要。

在制度创新方面,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只鼓励大学执行上级决策,不鼓励大学自主创新,创新活力受到抑制。大学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束缚着大学的制度创新能力。怎样的权力结构才有利于提高大学的制度创新能力?还有待于理论与实践探索。

大学要完成其使命,还有许多制度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开展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促进大学制度现代化,是我国大学完成其使命的需要。

## 现代大学制度的根基

邬大光\*

大学制度一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界定。宏观的大学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系统,包括大学的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和办学体制等;微观的大学制度是指一所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包括组织结构的分层、内部权力体系的构成等。在大学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大学这一机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还派生出了调节政府和大学之间矛盾冲突的中介机构,例如国外的大学

\* 作者简介:邬大光,厦门大学高教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 361005。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基金委员会, 大学教育审议会, 大学校长协会等。这些机构同样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范畴。

近代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制度起始于中世纪大学, “行会”制度及组织形式是中世纪大学最初的根基, 它以保护大学自身利益尤其是学者的利益和排斥外来干扰为鹄的。在此基础上, 近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理念开始形成, 这就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在一定意义上,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既是近代大学的办学理念, 同时又是近代大学制度的框架, 或者说是大学理念的“制度形式”。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彰显着大学的本质和特性, 构成了维系大学制度的基本内涵, 并延续了大学这一特殊组织机构的生命和活力。中世纪大学的“学者行会”, 使得中世纪大学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藩篱, 并被称为“象牙塔”; 但另一方面, 它所提倡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为近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大学制度的建构过程中, 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利益对大学制度的关注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事实上, 宏观的大学制度更多地反映着社会外部的要求, 它往往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大学制度上的缩影, 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而微观的大学制度——内部组织形式和权力体系更多地积淀了大学的历史和传统, 体现着大学自身的特性和“主体逻辑”。大学的本质和特性是建立大学制度的基础, 无论是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 大学制度的构建都应该是对大学本质和特性的关照。

随着社会和大学自身的发展, 大学制度也要发生变革。当大学的职能囿于培养人才的范围之内时, 大学组织形式的框架变化是以系、科变化为主的; 当大学职能拓展到科学研究时, 大学内部出现以研究为主的、与教学机构并行的研究机构; 当为社会服务作为大学的重要职能应运而生时, 研发中心、专业实验室、乃至科技企业等在大学内部不断涌现。所以大学自身的不断成熟、职能的不断拓展, 直接牵动了大学宏观和微观体制的变革, 而且往往是以微观体制的变化为基础, 进而影响宏观体制的变化。

但是应该说, 虽然从表面上看, 大学制度的变革是大学自身发展带来的, 然而, 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的发展。因为正是社会的发展和需要打破了大学“象牙塔”的藩篱, 并导致了二战之后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 以及由此引发的大学价值观的多元取向。换句话说, 是社会力量对大学的多元需求导致了大学制度的根本性动摇。例如, 1962年, 克拉克·科尔在《大学的功用》中提出的“多元化巨型大学”, 直接撼动了大学制度的根基。他认

为: “现代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在若干种意义上的多元: 它有若干个目标, 不是一个, 它有若干个权力中心, 不是一个; 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 不是一种。它不崇拜一个上帝; 它不是单一的, 统一的社群; 它没有明显固定的顾客。它标志着许多真、善、美的幻想以及许多通向这些幻想的道路; 它标志着权力的冲突, 标志着为多种市场服务和关心大众。”(陈学飞译, 《大学的功用》, 第96页) 科尔理论的直接意义非常明显, 即现代大学的理念和制度应采取多元的取向。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这种变化是外部的挤压造成的, 而当外部压力促使大学制度发生变化时, 往往忽略大学的特性和本质, 往往以损害和牺牲大学制度的根基——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为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说, 大学的历史就是大学制度的变革史, 而在这一过程中,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始终是支撑着大学制度维系、发展的根本所在。在17世纪以前, 大学经历了与宗教的抗争, 并从宗教中分离出来; 进而大学又时时处于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干预之中, 控制与反控制成为大学与政府之间的永恒主题。在20世纪以前的大学发展过程中, 大学制度的变化是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进行的, 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 随着大学的价值和职能逐渐被社会所认识, 多种力量的介入使得大学的类型、职能日趋多样, 大学制度也开始发生巨大的裂变。二战之后, 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以及由此引发的大学经费危机, 使得大学与市场的矛盾日益凸显, 市场的力量又迫使大学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合社会的需求。这就进一步冲击着建立在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基础上的大学制度, 并出现了大学制度合法性危机的话题, 由此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 人们正在赋予大学越来越多的使命和责任, 例如, 大学是动力站、知识工厂等。而在多样化的需求面前, 大学的合法性基础必然发生动摇, 大学制度创新迫在眉睫。

但是, 无论大学制度怎样创新, 它的根基不能改变。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组织机构, 汇集了以追求真理为使命的学者团体。尽管社会的外部因素不断地对大学和学者团体提出各种要求, 但学者团体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 集中体现在保护他们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根基之上。多元的社会需求和多元的大学价值观促使大学的制度发生着变化, 但无论如何, 大学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 缺乏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根基, 现代大学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唯其如此, 《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明确指出: 大学自治和学

术自由是 21 世纪大学发展的永恒原则。

世纪之交,关于我国大学制度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反思。我国近代大学制度起始于京师大学堂,并经蔡元培在北大的实践得以建立。应该承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国近代大学制度是一种舶来品,而作为大学制度根基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又与我国的学术传统有很大差别。概括地说,几千年来中国学术研究的根本理念是实用性的,人文社会科学以服务于统治阶级为最高目的,“学而优则仕”就是最好的体现;就是自然科学,本应以自由探究的精神研究无关乎社会的自然现象,也不可避免地为实用观念所左右,致使古代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大多是技术性,如四大发明等,而缺少科学理论、科学探究精神的涵养和积淀。到了近代社会,由于内忧外患,教育的外部功用进一步被强化,“教育救国”成了发展教育最重要的理由。大学制度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被引入我国,虽然有识之士力倡自由和自治的理念,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终究没有完全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大学制度又一次被迫转变,变成一种附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计划制度”,“服从”成为大学制度构建和运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计划制度”的弊端已经逐渐浮现出来,而以“服从”为基础的制度已经无法帮助大学应对社会的需求和挑战。那么,应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大学制度?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根基究竟何在?是我们构建对世纪大学制度必须回答的问题。

大学制度的形成受制于多种因素,但就其内在的动力来说,大学制度源于大学理念,折射着大学理念的烙印,大学制度是大学理念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大学理念是大学制度的根基。例如,在大学开放性理念指导下,“无墙大学”、“开放大学”等大学制度获得了合法性基础;在大学教育产业的理念下,现代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模式介入大学;在大学为社会服务的理念关照下,大学内部出现了产学研一体的科技企业。

一千年大学制度的变化史,正在向人们昭示着大学制度的变化受制于越来越多外部因素的事实。在 21 世纪的今天,影响和制约大学制度变革的内外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加速到来、网络技术对大学的冲击,已经远远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对大学制度的挑战。所以,越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需求,越应该夯实大学制度的根基。只有这样,大学制度的改革才有方向,大学制度的创新才有根本。

## 现代大学的管理体制、模式与机制取向

阎志坚\*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和变革是不可或缺的。理顺政府、高等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的责权利分明,应该是在我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

高等教育管理系统在整个高等教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历来都十分重视高等教育的管理。传统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十分注重政府对学校的调控、约束,但从现代大学角度出发,建立新型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应更加着眼于使宏观调控、组织协调与服务相结合,使管理更加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

我国长期以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其特点就是权力的高度集中,甚至形成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集举办、管理和办学三权为一身的状况,对高等学校的管理除计划、指挥、监督、控制外,更多地显示出“包办”、“代办”的倾向,往往造成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长此以往,高等学校就缺乏或丧失自主办学的活力和动力。现代大学制度下的高等学校,应是在政府的统筹规划、宏观指导下,依法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实体,这就要求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

近年来,我国进行了以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明确提出要通过改革,逐步实现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以地方统筹为主,政府统筹规划、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新体制。随着共建、调整、合并、合作等一系列的措施的出台以及《高等教育法》的颁布实施,管理体制改革的取得很大进展,但目前改革的进程距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还有一定距离。在传统的管理思想的作用下,管理者仍然不能摆脱过去管理思维定式,职能的转变、角色的转换远跟不上形势的需要,相应的模式与机制也尚未形成。正因为如此,一些改革的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高等教育管理是一个复杂系统,在管理者眼里,往往看重的是管理的干预性和控制性,而高等学校则更加注重管理的合理性与效率性。现代大学制度

\* 作者简介:阎志坚,男,教育部高教司文科处处长,厦门大学高教所博士生。北京,100816。